

哈代小说中的阶级书写

陈 珍

(青海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7)

摘要:19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推动下的社会变革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中产阶级势力逐渐壮大,贵族势力日渐式微,门第观念不断淡化,阶级意识不断增强,金钱财富成为界定阶级层次的价值尺度,阶级书写成为文学描摹现实的重要主题,哈代小说继承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从阶级层次、阶级身份、阶级变迁、阶级矛盾、阶级意识、阶级与婚姻关系等方面展现了英国西南农业社会在改革大潮中的阶级状况,全面揭示了阶级基于财富资本的复杂的人文内涵,体现了哈代对社会阶级百态的终极关怀,勾勒出英国乡村的社会阶级图景,成为 19 世纪英国农村阶级态势的缩影。

关键词:哈代小说;阶级意识;阶级层次;阶级身份;阶级变迁;阶级形态

中图分类号:I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0)06-0074-06

19 世纪英国工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一步变革,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形态和阶级结构,中产阶级的势力逐渐壮大,贵族势力日渐式微,门第观念不断淡化,形成了经济定位和财富主导的价值取向,金钱财富成为衡量社会地位和界定阶级层次的尺度,阶级意识不断增强,阶级归属备受关注,阶级成为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自奥斯汀到哈代,阶级意识主导英国小说”^{[1]71}。阶级问题在哈代笔下的乡村地区虽然没有盖斯凯尔夫人、狄更斯、萨克雷、特罗洛普笔下的城市那样复杂尖锐,但依然有着强烈的等级意识,左右人物的身份地位。作为后期扛鼎作家,哈代继承了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以敏锐的眼光捕捉了家乡多塞特的社会现实,在小说文本中记录了 19 世纪英国西南农业社会的阶级现状,艺术地反映了当时英国阶级变迁及其社会影响,尤其在身份认知和男女婚恋方面的影响。哈代小说,尤其是以《苔丝》《还乡》《卡斯特桥市长》为主的“性格与环境小说”,从阶级层次、阶级身份、阶级变迁、阶级矛盾、婚姻中的阶级壁垒几个方面展现了英国西南农业社会在改革大潮中的阶级形态,从人文层面全面揭示了阶级基于财富资本的复杂内涵,反映了作者对社会阶级百态的人文关怀,勾

勒出英国乡村的社会阶级图景,成为 19 世纪英国农村阶级状况的缩影。

一、阶级层次与阶级归属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19 世纪英国社会阶级呈现出上、中、下三个阶层,或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工人阶级。19 世纪社会规模不断扩大,阶级“金字塔”变高变薄,社会顶层财富大幅增加,其余四分之三的家庭,共享不到五分之二财富。最上层由贵族和土地士绅组成,随着工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加入了一些工商业巨富,第二层为广泛的中产阶级,包括高级职业人员,从银行业到制造业、零售商、持有资本和股份者、办公职员等,最下层为基数最大的劳动阶级,他们没有资产,靠劳动维持生活,其中农业工人占最大比例^{[2]50}。阶级层次异常悬殊,1867 年有数字显示,2% 的顶层阶级占有国民总收入的 37%,相当于人口比例占 75% 的底层阶级的总收入^{[3]420}。“阶级层次是构建维多利亚社会生活的基本元素,离开了阶级层次,维多利亚人几乎无法认知世界。”^{[2]48}阶级层次是解读维多利亚社会百态的重要窗口。哈代小说中的人物大部分属于社会最下层的农民、农业工人或乡村工匠,中产阶级乡

收稿日期:2020-05-09

作者简介:陈 珍(1967-),男,青海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E-mail:chenzhenfrank@163.com

绅或介于二者之间,很少出现最上层的贵族阶级。阶级层次在哈代的艺术世界无处不在,在弗林库姆阿什农场、塔尔伯塞奶牛场、小欣托克林区、卡斯特桥粮行、韦特伯里农场、雅尔伯里林,读者都能感受到乡村农业社会的农场主与雇佣农工之间的阶级差异,反映了资本主义雇佣制度在威塞克斯地区已具雏形。哈代小说记录了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入侵宗法制农业社会及农民阶级不断消亡的历史。格罗比、克里克、麦尔伯里、亨查德、巴斯谢芭、吉尔弗雷雇主阶层与受雇于他们的雇工阶层的社会地位界限鲜明,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阶级鸿沟,前者生活富裕、衣食无忧,而后者生活贫困、温饱难保。处于社会底层的农业工人的劳动非常廉价,工资很低,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生活异常悲惨,一首流行于十九世纪的民歌《可怜的英国劳动者》是对当时英国农民悲惨生活的凄苦咏叹。

19世纪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社会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公平竞争”理念的观照下人们无限放大了利益诉求,人际关系由传统的互助关系演变为卡莱尔所描述的“支付关系”,随之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意识——社会阶级的现代体会^{[1]78}。哈代小说具有强烈的阶级感,呈现赤裸裸的阶级差异,哈代的第一部小说《贵妇与穷汉》因其强烈的阶级情绪和过于现实的阶级表露被出版商所拒绝。《林地居民》中,贵妇人查曼德夫人为了配栗色的头发高价收购了玛蒂的一头浓发,穷苦姑娘为生活所迫,无奈卖掉了自己的头发,因为价格相当于她一周的劳动报酬,即30先令。玛蒂出卖头发的这个情节在小说中具有非凡意义,为了吸引情人费兹皮尔斯查,曼德夫人依仗自己的财力购买玛蒂头发,而玛蒂因为贫穷只能忍痛割爱,卖了头发后的玛蒂带着小帽羞怯地遮掩窘态,穷苦姑娘牺牲了自己的美为贵妇人创造美,头发成了阶级间交易的商品,成为阶级落差的佐证。玛蒂和查曼德的阶级落差犹如狄更斯的《小杜丽》中的玛吉和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中的罗莎蒙德,前者的衣衫褴褛与后者的华丽服饰形成了强烈对照,二者之间的贫富差距揭示出维多利亚社会巨大的阶级悬殊问题。19世纪社会是以财富界定阶级的时代,阶级层次意味着占有不同量的财富,财富是决定阶级归属的根本标准。

二、阶级身份与社会地位

卡尔·马克思主要从经济的角度研究阶级问题,经济状况成为阶级界定的焦点,小说家则从生活方式着手全方位研究阶级现象,将阶级视为经济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综合媒介加以考量,捕捉经济左右下的阶级人文表现,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阶级身份。阶级身份是人们认识和评价人物的根本,阶级与财富是人物建构人生的素材。《白衣女人》中的男主人公沃尔特遇到白衣女子时的第一反应是对她阶级身份的定位,“那举止做派不完全是上等人家的贵妇,也不是社会底层的寒微女子”^{[4]24}。在哈代的威塞克斯,贫富差异决定着阶级秩序,阶级秩序规定社会身份,阶级身份决定人的举止态度。博尔伍德和夏纳为代表的富户的孤高冷傲与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的谦卑低贱形成各自的阶级符号。《林地居民》中林区木材商麦尔伯里的相对低下的身份使格蕾丝在城镇学校遭受同学的冷遇鄙视。《绿荫下》中的梅伯牧师主动给赶车人鲁本打招呼的举动使鲁本受宠若惊,因为违反了阶级等次基础上的先后秩序,阶级身份决定了人的社会地位和尊卑贵贱。小说通过众乐师集体会见牧师场面的描写,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乡民们表面上的鲁莽直率、无所畏惧和实际上的胆小羞怯、缩手缩脚,把他们那种由于地位低下、阅历有限而造成的自卑与好奇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

文学作为生活的记录,对阶级问题的展现呈现出多样化,涉及除财富资本外的诸多因素,从生活的层面全面揭示阶级丰富的人文内涵,《一双蓝蓝的眼睛》中,史密斯父亲的穿着显示出他卑微的身份,“贵族妇女一般知晓,体面人不会穿过了时的老土外衣,一个穿这种衣服的乡下人在她们眼里就像一只虫子”^{[5]204}。《绿荫下》中,名贵的雨伞彰显了主人梅伯牧师的上等身份,精致的靴子道出了主人范茜的优越地位。“在个人和家族历史不再昭示既定的社会身份的时代,只能靠更加显著的社会标志来认识一个陌生人:言语、举止、住房、生活方式。”^{[2]51}除了房屋建筑、吃穿用度、服装鞋帽,言谈举止是哈代展示阶级差别的重要手段,其中人物语言是个人身份的有声佐证,标准语与方言间的差异

就是操持者教育背景、社会身份和阶级地位的文化符号,是阶级人文内涵的重要体现,是彰显个体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鉴于语言与身份的逻辑关系,哈代常用方言来表现人物阶级和社会身份,《远离尘嚣》中大谷仓中当地土著的方言,显示了他们处于社会底层的、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身份,《绿荫下》中范茜在婚礼旅行前告诫父亲和鲁本不要用土语,土语被视为对上等人物的冒犯或不尊重。维多利亚下层阶级和上中层阶级的区分主要在于是否用送气音“h”,送气音是下层社会的语言符号。《远大前程》中的皮普和继父都带有送气音,作者暗示这可能成为皮普实现远大前程的一个身份障碍。即使在农民阶层也不乏对语言的敏感,鲁本夫人对土豆叫法的甄别细节反映了语言在阶级表现和身份建构层面的功能。《苔丝》的叙事者也提到了苔丝因语境不同而转换语码,在家讲方言,外面或遇上有身份的人讲标准语。

教育是实现个人抱负、改变阶级地位的社会阶梯,许多乡村子弟却因贫穷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帮助家庭勉强维持生计,童年的裘德给地主家看庄稼地,聪明的裘德空有报复,贫穷拒之于大学门外,壮志难酬,含恨而终。教育本身是提升阶级层次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渠道,19世纪60年代初,年轻的哈代也有像裘德一样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抱负,但由于种种原因,遗憾地没能实现。哈代本人通过自我奋斗爬到了“年轻人实现抱负的阶梯”的顶层,其社会身份从底层上升到了高层。上流阶层需要常春藤名校的光环和学历的佐助,在阶级意识浓郁、家庭出身和教育背景受到尊崇的维多利亚社会,像狄更斯一样,哈代本人的寒微出身和缺乏大学教育的背景一度成为哈代最敏感和最脆弱的神经。哈代在1880年11月20日的笔记中对阿诺德城市文化中心主义进行了反驳,强调了乡土文学的价值^{[6]149}。《小说与诗歌总集序》中哈代再次表达了乡土情感,这些表达折射出他在主流文化语境中对自己非主流出身的焦虑,菲利普·戴维斯在《牛津英国文学史:维多利亚人》中认为哈代的这种反驳正好印证了他缺乏正规大学教育的内心缺憾,这种缺憾是包括狄更斯在内的许多缺乏正统高等教育背景的小说家共有的心理症结^{[7]239}。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维多利亚时代,从社会底层跻身

于中产阶级的人对自己的出身一直存有羞愧感。詹姆斯·密尔从未告诉儿子自己的出身;狄更斯也从未向妻子透露过自己的童工经历。出身寒微,后来居上,卑微的身世是哈代一生难以释怀的心结。

三、阶级变迁与阶级矛盾

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变革与转型为个体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使童话般的“从赤贫到巨富”(rags to riches)成为了可能,反之亦然。皮普的身份变迁是典型例证,从他的言语可管窥阶级变迁,“我是铁匠的儿子,没错,可那是过去;现在的我早就不是过去的我了”^{[8]248}。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也描述了乡村社会的阶级变迁,“古老的乡村社会也在发生着细微变化:不光是明显的沉沦败落或发家致富地位攀升的优秀青年,也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在不断改变着社会关系的界限,让人逐渐意识到新的依存关系。其间,有的人地位有些滑落,有些人有些提升:人们丢弃了送气音,积累了财富,讲究的绅士成了地方标榜的人物”^{[9]97}。和维多利亚主流小说家一样,哈代小说中的阶级呈现出动态趋势,社会变革引起的价值观的改变使人们对社会阶级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改变了原有的阶级定位,形成了以财富为核心的新的界定标准。哈代的动态阶级观在《苔丝》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工业革命摧毁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催生了新的阶级——农民无产者,德伯家的坟墓象征时代变迁和阶级更替。圣查理时代的“御橡爵士”沦为破落的小商贩,能验证家世的只有一枚印章和带有家徽的银匙,还有毫无价值的家族墓地。德伯家的没落是一个阶级的历史写照,败落世家还有艾克特尔家、霍西家、特林厄姆家,伊兹家也是曾经的老门户。在金钱至上的维多利亚时代,显赫的家史和曾经的辉煌已然成为虚无的历史,“古老的家世,祖宗的尸骨,卓著不朽的业绩,德伯家的相貌,这些还没有给苔丝在人生的战斗中帮上什么忙,甚至在一群普普通通的村姑中间也没占个上风,连一个舞伴都吸引不过来。没有维多利亚时代的金钱作后盾,诺曼的血统又算得了什么”^{[10]11}。时代变了,贵族后裔的苔丝任凭新型资本家亚雷的摆布,从阶级变迁的角度来看,《苔丝》是一部名门世家的阶级没落史。

哈代以唯物主义的发展眼光诠释了英国阶级

的历史变迁,赋予小说宏大的主题,置叙事于历史语境,小说中亚雷的父亲原名西门·斯托,在北方做生意发了财后,凭借资本买名门望族的姓氏以粉饰门楣。贵族头衔失去了原有的权利内涵,失去了政治实质,成为有钱人装点门楣的饰品和可以用现代资本购买的商品。工业革命起于1769年的英国,经济模式的变化带动了社会阶级结构的调整,早在18世纪末,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提议,年收入超过20 000英镑的富人如果个人申请的话,应该授予贵族称号。贵族头衔和门第在阶级流变中沦为精神财富,丧失了物质能量和政治功能。然而在英国生活社交领域,只有钱的话无法保证跻身于上流社会,金钱与门第是上流身份的理想标配,这是斯托购买德伯姓氏,追求名分的真实意图。《远大前程》中的皮普在社会阶层间沉浮,有钱不一定被上流社会接纳,教育、礼仪、贵重服装、家具、仆人、合适的朋友、金钱,所有这一切也无法抹去他出身的污点。身世制约阶级所属,同时使之复杂化。在萨克雷的《名利场》中,那位靠牛油发迹的富商,常遭受上层阶级的奚落。一般出身稳定的阶级成员应该是出生于本阶级的人,阶级层次后来居上者本身不被上层阶级所接纳,但他们为下一代或更晚的一代提供了跻身上层的物质条件,因此维多利亚小说中常常出现不想知道自己祖上的讽刺描写。

《苔丝》中贵族德伯氏的没落和斯托家的发迹揭示了世事变迁与阶级更替,金钱比门第更为重要,资本是社会身份和地位的决定因素,金钱取代了门第,资本家取代了贵族,资本经济逐渐取代封建土地经济为主导,“工业革命前夕,土地外的国家财富在整个英国资产中只占不到三分之一的份额,到1860年已占到一半”^{[11]189}。《冷漠的人》中的女中产阶级波拉·帕沃与破落贵族夏洛蒂·斯坦西之间的关系,就是维多利亚社会新型阶级结构和阶级变化的折射。后者的出身和血统在前者之上,但是她们的实际关系中,波拉的地位要高于夏洛蒂,后者实际上已沦为半女仆的身份。在维多利亚社会,门第已成为毫无实际意义的符号,只有财富才有现实意义。门第头衔是毫无内核的荣誉,但无实际价值,丧失了话语权。“中产阶级工业利益”和“贵族土地经济利益”的对峙产生了直接抵触的“阶级意识”^{[1]71}。《非常手段》中的女地主阿尔克里夫

无法理解,一个身份低下的佃农的儿子还会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有自己的见解、以远超出凯里福德教区才有的大气姿态看待社会,对阶级从属抱有发达之人才有的非正统观点。芭斯谢芭与奥克的身份的戏剧性变化进一步反映了维多利亚乡村社会的阶级动态,原来的挤奶姑娘成了庄园主,而曾经的牧主却沦为一无所有的牧羊人。哈代小说还从另一个层面记录了19世纪的阶级变迁,广大农民走向城市,成为城市无产者,哈代将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形象地比喻为:一种水受到机械驱动,往山上倒流的趋势。人口流动推动着阶级结构和阶级比例的变化,以手工业者为代表的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演变为城市无产者,构成了英国无产阶级的主力成分,像曼彻斯特、利兹、谢菲尔德等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人口增长了一半^{[12]78}。

哈代小说的阶级书写还涉及多塞特地区的阶级矛盾和阶级间的排斥情绪,阶级矛盾暗流涌动,博弈无处不在,多塞特乡村社会阶级意识浓烈,以阶级等级和社会地位为基础的阶级阵营界限分明,《卡斯特桥市长》中的讪奸游行将阶级摩擦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次讪奸游行有明确的报复意图,身处卡斯特桥市社会最底层的米克森巷居民想借机“好好乐一阵子”^{[13]324}以解长期以来积压在心头对上层阶级的不满。让那些身居高位的有闲阶级丢丑,“对于辗转于他们脚下的人来说,是一种至高无上、淋漓痛快的享受”,讪奸游行“并不(仅仅)是开一场玩笑,而是来一顿报复”^{[13]324},是一场以赵普为代表的底层民众向以法夫瑞、露塞塔,甚至王室显贵为代表的上层发起的没有流血的战争,也是末流的“彼得手指”向上流的“国王手臂”发起的挑战。讪奸游行是社会底层民众向上层社会发起的挑战,折射出社会上下阶层之间的二元对立。哈代通过讪奸游行暴露了以卖粥妇为代表的米克森巷穷苦市民仇富、仇权、仇美的心态,展示了卡斯特桥市的阶级矛盾。从阶级政治的角度看,苔丝到富贵乡绅家攀亲的举动就是底层阶级向中产阶级祈求怜悯。苔丝的美貌犹如玛蒂的头发转变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充分说明了维多利亚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差别,作者没有给予阶级评论,主人公的遭遇和处境深刻反映出英国西南农村社会严重的阶级问题。苔丝一家被赶出马洛特村后,苔丝又一次委身于亚雷,贫穷是她两次“堕落”的根源,苔丝和亚

雷之间的矛盾影射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上下层社会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哈代将个体命运放置在社会阶级大语境中加以探讨,从而赋予人物以丰富的社会内涵。

四、爱情婚姻与阶级壁垒

恩格斯指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崭新的阶级——城市无产阶级,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势利倾向或阶级意识(class feeling)^{[1]78}。阶级的存在由来已久,19世纪的社会变革使阶级意识更加强烈,阶级问题更加突出。阶级意识在婚恋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阶级意识是19世纪英国婚恋文学不可回避的主题,艾米丽·夏洛特笔下的简爱对身份的顾虑,乔治·艾略特的罗莎蒙德对地位的渴望,萨克雷的夏普·陪基对财富的追求皆出自阶级意识。哈代小说中的阶级等级相当明确,财富悬殊和阶级壁垒是男女双方在爱情婚姻上很难逾越的鸿沟,也是造成无爱婚姻甚至家庭悲剧的原因。在《林地居民》中,农民老沙斯死后根据英国乡村的房产终身承租制,贾尔斯的房产转移到了查曼德夫人手中,贾尔斯无处栖身的窘境促使木材商麦尔伯里解除了女儿格蕾丝与贾尔斯的婚约。富有医生费兹皮尔斯成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格蕾丝门当户对的追求者,贾尔斯只有选择穷苦的玛蒂。哈代笔下的青年男女在婚恋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矛盾深刻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以金钱为底线的扭曲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维多利亚社会经历着激烈的社会变革,传统价值观受到挑战,拜金主义大行其道。不同阶级的青年男女的结合需要冲破阶级壁垒、敢于挑战世俗偏见的勇气,从这个角度分析,范茜为代表的女性人物身上展现出了崇尚自由、追求真爱的新女性形象特征,同时又带有游离于社会交替、徘徊于新旧观念的矛盾心理。

奥斯汀认为婚姻是人生“变化的起点”,社会随着外在经济推动而变革,人物以经济原因而结婚。安东尼·特罗洛普1864年出版的小说《阿灵顿的小屋》中的克洛科比与莉莉、盖斯凯尔夫人的《克兰福德》中的托马斯·霍尔布鲁克与麦蒂小姐的爱情都沦为阶级等价观念的牺牲品,阶级层次是婚姻难以逾越的障碍。凯斯·威尔森(Keith Wilson)主编的《哈代指南》收录了罗杰·艾博逊的文章“穿不透

的墙:哈代与阶级”,该文强调了哈代小说中难以逾越的阶级壁垒。《一双蓝蓝的眼睛》中的史密斯作为农民的儿子渴望能娶到贵族小姐阿尔弗雷德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但也清楚地认识到他与阿尔弗雷德之间无法弥合的身份落差,斯旺考特先生严斥女儿无视阶级界限的婚姻观念。《塔上二人》中的克利夫因地位卑微遭遇了同样的鄙视。荒原上的婚姻因阶级地位而对号入座,依贫富形成了对应关系,《还乡》中的尤苔莎与克林在荒原算是社会地位平等的一对,韦狄的身份更接近朵荪,后来克林对堂妹下嫁红土贩子文恩略表遗憾。克林的眼疾阻碍了他在荒原兴办教育的抱负后,最终沦为以割常青藤为生的穷苦人,经济地位的下滑使心高气傲的尤苔莎投奔旧情人韦狄,作为阶级标志人物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身份是决定婚姻走向的重要砝码。《绿荫下》也探讨了阶级和婚姻问题,范茜的父亲吉尔弗雷是威塞克斯爵士的总管,母亲曾是大户人家的保育院教师,算是殷实的中产阶级,范茜本人毕业于政府资助的师范学校,而迪克的父母皆为普通农民。因此,范茜和迪克的婚姻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吉尔弗雷认准了农夫夏纳的财富,范茜也留恋梅伯牧师的体面,内心矛盾纠结。范茜和迪克的婚姻违背了固有的阶级秩序,在看似繁华的表象下暗含潜在的危机,二者社会地位和教育背景上的差异也许会为他们的婚姻带来障碍,妨碍他们的心灵交流与融合。哈代在第五章大结局中做了这样的评价,身为车夫的迪克着实配不上范茜,尤其那双精致的眼睛,反映了作者从自身的婚姻体验对阶级差异与婚姻矛盾的思考。

婚姻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阶级攀升的重要媒介,而对于男性来说只有靠自己的奋斗来实现阶级逾越^{[14]422}。男性有独立的阶级所属,而女性则更多依附于自己的丈夫,正如《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的威克姆先生所言:“我们不管一个女人的职业,只在乎她属于谁。”在维多利亚小说中,往往是女性通过婚姻从社会低层进入社会高层,哈代小说却倾向女尊男卑式的婚姻模式,比如,《远离尘嚣》中的芭丝谢芭和奥克、《一双蓝蓝的眼睛》中的埃尔弗雷德和史密斯、《冷漠的人》中的波拉·帕沃与索默塞特、《绿荫下》中的范茜和迪克、《塔上二人》中的康斯坦丁夫人和克利夫、《无名的裘德》中的艾拉贝拉与裘

德。哈代小说中,女方条件往往优越于男方,这种与同时代小说男高女低式的模式迥然不同的现象与哈代本人的婚姻状况不无联系。1870年,哈代在北康沃尔的圣朱利奥特与埃玛·吉福德相遇,于1874年走进婚姻殿堂,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并不是一帆风顺。埃玛是圣朱利奥特教长的妻妹,出身于比较体面的上流社会阶层,其父曾经是律师,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各方面都高于哈代家庭,这种出身和家庭背景上的悬殊给双方都带来了极大挑战,也是婆媳不和与夫妻矛盾的根源所在。因此,哈代对婚姻中的阶级差异非常敏感,哈代的多部作品都涉及男女婚恋现实中的阶级层次和阶级壁垒,婚姻中的阶级问题成为哈代小说一个值得深思的重要方面。

19世纪社会变革打破了英国原有的阶级格局和阶级秩序,中产阶级的势力逐渐壮大,金钱财富成为衡量阶级层次的价值标准,阶级意识不断增强,阶级书写成为文学描摹现实的重要主题,哈代继承了英国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从阶级身份、阶级变迁、阶级矛盾、阶级与婚姻的关系等方面展现了英国西南农业社会在改革大潮中的阶级状况,全面揭示了阶级基于资本的复杂的人文内涵,成为19世纪英国乡村社会阶级状况的时代缩影。

参 考 文 献

- [1] JULIA P B. *Class and Money*[C]//*The Victorian Novel*. Harold Bloom, ed. New York: Chelsea House, 2004.
- [2] JAMES E A. *The Boundaries of Social Intercourse: Class*

- in the Victorian Novel*[C]//*A Concise Companion to the Victorian Novel*. Francis O' Gorman, ed. Londo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 [3] PERKIN, HAROLD. *The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M]. London: ARK, 1985.
- [4] COLLINS, WILKIE. *The Woman in White*[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9.
- [5] HARDY, THOMAS. *The Woodlanders*[M].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Classics, 2004.
- [6] HARDY F E. *Life of Thomas Hardy*[M].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2007.
- [7] PHILIP D. *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ture History: Vol. 8 / 1830 - 1880 the Victorian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 [8] DICKENS, CHARLES. *Great Expectation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6.
- [9] ELIOT, GEORGE. *Middlemarch*[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4.
- [10] 托马斯·哈代. 苔丝[M]. 孙致礼,唐慧心,译.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2.
- [11] BRIGGS, ASA. *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M].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3.
- [12] CHILDERS, JOSEPH W. *Industrial Culture and the Victorian Novel*[C]//*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Victorian Novel*. Deirdre David, e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3] 托马斯·哈代. 卡斯特桥市长[M]. 张玲,张杨,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14] ELLIOT, GEORGE. *The Mill on the Floss*[M]. Ontario: Broadview Editions, 2007.

The Writing of Class Affiliation in Hardy's Novels

CHEN Zhe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ha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Xining 810007,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rive of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broke the original social form and the class structure. Because of the fact that the middle class was growing in power, the aristocracy was in decline, family values were fading, class consciousness was enhanced, and money and wealth became the measure of value that defines the class level, the writing of class affiliation provided themes for realist literature. Succeeding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tradition of realism, Hardy's novels truly reflects the class situ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communities in Southwestern England in the aspects of class stratification, class identity, class mobility, class conflict, class awareness, class and marriage, and so on. In a word, his works discloses the complicated humanistic connotation that the wealth and capital is the basis of class sketches the social class in English countryside and epitomizes the situation of 19th - century English class.

Key words: Hardy's novels; class awareness; class identity; class hierarchy; class mobility; class form

【编辑 王思齐】